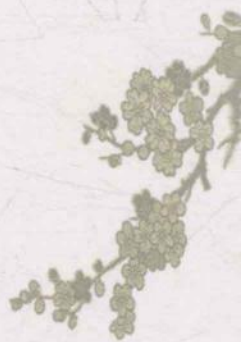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山右学术丛编

YU JINGJIA
XIANSHENG WEN JI

于靖嘉先生文集

于靖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山西大学山右学术丛编

YU JINGJIA
XIANSHENG WEN JI

于靖嘉先生文集

于靖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靖嘉先生文集 / 于靖嘉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5

(山西大学山右学术丛编)

ISBN 978-7-5457-0554-6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6418 号

于靖嘉先生文集

著 者: 于靖嘉

责任编辑: 任俊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德胜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6.75

字 数: 7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54-6

定 价: 6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于靖嘉先生

庆贺于先生九十寿辰

99.4.17



山大中文系部分师生为于嘉靖先生九十华诞祝寿时合影

回忆业师于靖嘉先生(代序)

冯良珍 张 儒

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五年了，现在先生的论文集终于能够付梓，少许释然之余，我们不禁回首从先生学习和工作的日子，往事历历在目。在此略记一二，以志缅怀。

一

首先从“先生”这一称呼说起。在我们读大学的年代，凡授课教师不论教授或是助教一般都称老师，被尊称为先生的教师是极少数的，而女教师中被尊称为先生者只有于先生一人。这称呼本身也可使人感到于先生在这个环境中的德高望重。到后来，学界又尊称为于老。我们几个弟子则一直称呼于先生。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1979年金秋10月，于先生门下招进了三名古汉语研究生，即我们二人和来自吉林的杨春兴师兄。这是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常来旁听的还有三位，即本系的一名年轻女老师、晋中师专的一位男老师（后成为教育学院副院长）和于先生的长子。于先生是一个性格刚强而不让须眉的人，在那段时间特定的条件下，她硬是一人为我们担起了全部的专

业课教学任务。开设了汉语史(当时叫古代汉语)专业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言语法四门专业课。让她的助手萧泰芳老师给我们开设了古代文选课,亦即文献导读课,并负责我们的答疑与管理。

先生给我们开设每门专业课,都要认真备课,但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用她珍藏的北师大名师们所传承的教学资料和方法。比如,讲古汉语的发展,她拿出她的恩师黎锦熙先生1926年绘制的一张大图表:《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表》(此表复印件先生曾赠送给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故伍教授在国际会议上出示称,“黎锦熙先生早年的学生于靖嘉教授特为我复制”云云);讲文字学课,她讲到许慎《说文解字》,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记忆的“五百四十部首歌”等,要我们熟读背诵(之后我们认真抄录,并配以篆楷和读音。至今我们的研究生一直传承使用着,已经几易其稿,后转为电子版,为其注音、注解,并对其中的篆字加配对应的楷体,进行了种种加工而用于教学);讲音韵学,给我们从清代的大家讲起,并使用了她的恩师钱玄同著的《文字学音篇》作为主要参考资料;讲语法学,则从讲授《马氏文通》开始,接着让我们研读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等经典著作。再一个特点是在那个刚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她积极与学术界同行交流,获取新的资料、教材,如她为我们开设训诂学时,系统的教材还很少见,她则特意联系同行为我们求购到周大朴先生最早的《训诂学要略》做辅助教材。让我们有幸接受了正宗的小学 and 章、黄学派思想的学术指引和熏陶。我们三人分别做了专书语法研究、文字演变研究、孟子语言逻辑几个方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得到了先生精心的指导,

并组织了以我们的大学古汉语老师戚桂宴教授为主席、著名古文字学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颌先生等为评委的答辩委员会,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专家们的质疑和指点使我们得到了之前不曾有过的学术锻炼和提高,对我们后来的学术成长影响颇深。

于先生担任我们的导师时,已进入古稀之年。由于课程繁重而先生又过于认真,以至于将她累垮,腿部脉管炎加重,不得不住医院休息治疗。但是刚强的于先生硬是咬牙支撑下来了(培养我们毕业之后,先生又和戚桂宴先生联合招收了第二届研究生)。

我们研究生毕业后,于先生向学校打报告留下来我们二人,以充实古汉语教学师资。于先生责任心特别强。我们第一次登讲台前,于先生首先亲自看我们的讲稿并进行修改指点,然后让我们单独给她试讲。不仅如此,还在我第一次登讲台时,亲自去班里听课,结果的确赢得了班里学生的好评。这种对教学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为我们也为学生极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也成为我们之后教学生涯的楷模。

二

我们留校后,就在于先生做主任的汉语教研室工作。那时正值重新认识和评价“文革”的运动,旧的派性思想有所抬头。有一次到于先生家,谈完正事后,她说,以后尽量不要来我这里,好自为之。先生此言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心里觉得很委屈。先生为什么要拒学生以远呢?后来才了解到先生完全是出于保护学生的意识,她怕学生因她的派性恩怨而受牵连。其实这也是她受尽

“文革”折磨所留下的余悸。但我们从未听到于先生说过系里哪个教师的不是。我们感到先生非常冷静、理性、克己。即使她被人误会受到委屈,其后也不去责人,而是宽怀大度地去理解人,握手言欢。

我们到先生家中,从来没有看到她做家务。她总是坐在她的客厅兼书房的沙发上伏案翻阅资料。她一直是由家人从教工食堂里买饭吃,家里只是有时略作添加而已,保持着集体食堂那种简朴的饮食生活。

先生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有着深厚的资历。山西大学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时,常常请她出席并给师生讲演,还在报刊上登载过关于先生事迹的报道。她与老伴严德浩教授学生时代在抗战时期相识后而结为伉俪,并放弃了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国文系讲师之职,随老伴为支援山西而来到太原,几经调动才辗转来到山西大学中文系。老伴曾在我们面前夸于先生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到了高年,却表现出她重于感情的一面。老伴重病住院期间,她住进医院日夜陪侍九个月,虽然也有别的家人协助,但她贴身守护,面对已经失语的老伴,她设法用各种方式沟通并给以安慰,常使老伴热泪夺眶。一直坚持到老伴最后的日子,先生的体重却减少了三十多斤!其相濡以沫的深情,感人至深。

于先生九十岁后做了几次大的手术,胆囊切除、股骨头置换、因肺部严重感染而危急入院等。有几次她都冷静地自己在手术单上签字,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记得胆囊切除那次,因为疼痛所致,她身心受到打击。入院做手术前她担心结果难料,让一直在身旁照顾她的女儿通知萧老师、和我们二人赶到医院门诊部见上一面,并最后敲定手术治疗。多年来也许我们三个就是

同一系内先生心目中最亲近和信赖的人吧。深夜里,身为外科医生并一直照顾先生的女婿和我们把她推进手术室,并抬移到手术床上。当于先生亲自在手术单上签下姓名年龄等信息时,医生护士才惊讶地知道这是一位九十三岁高龄却思维清晰的老教授!他们不禁为之肃然起敬。

先生的晚年是轻松而幸福的。有一次我们去她家看望她,她大笑着告诉我们:“瞧,我买了一台电脑,开始学习操作。但这手就是不听使唤。我就又买了一台钢琴!我在钢琴上练得手指灵活了再操作电脑打字!”这时的于先生已经卸下了工作和生活的重担,多少想让自己换个任性的活法。但我仍听得出来她是在开心地自嘲。她一辈子养育子女、培养学生,全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她终于可以潇洒地“玩”一把了,她的幸福之感溢于言表!同时,先生以九十余岁之高龄仍要追赶时代步伐的举动,无疑仍是她自强不息的性格使然。

先生到了老年才开始把与学生之间的师生义转为师生情。她常常讲起她的传奇般经历,如抗战时乘竹筏摆渡逃命的惊险经历、“文革”中为避武斗而连夜仓惶逃往老伴桂林老家的经历等等。她把我们这些弟子都当成了自己的子女,分享快乐、分担忧愁。

除了我们几个在校内的弟子之外,她还有不少以前在太原师范或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本科教过的老学生,他们也常常惦记着先生。如太原师范师四班(1950—1953)的老学生们每年拜访先生,还常组织一些有意义的联谊活动请于先生一起参加,他们还为先生举办了九十华诞的庆祝会,并在于先生逝世后仍在用他们的方式悼念先生。在先生九十岁生日前后,包括我们在校的

几个弟子在内的中文系多位老师、数位曾从先生学习的校外的老学生,共同为于先生举办了一个简朴优雅的纪念宴会,时任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的陈茂林教授一行几人代表弟子们给于先生赠送了一块铸有“师魂”二字的铜匾。多年后她的另一位曾任教于太原市委党校的老学生郑学诗教授则将于先生的照片和介绍放在他的博客“三晋人物”栏目中,以此来缅怀先生。他谈及与先生其他的弟子一样被先生的大爱所感动,称先生如心目中的母亲,至今忆之仍动情不已。是于先生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心血和热情浇灌出了这样的师生情谊!

三

先生晚年在学术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她对戴震《转语》的研究。这也是她对我们谈论最多的一项研究。一段时期内,我们每每造访先生家,总看到她在埋头伏案工作,沙发上、茶几上到处展放着正在查阅的书籍资料。在和我们的交谈中,总是情不自禁地叙说着她对《转语》的新发现。

先生撰写的研究论文,曾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宣读,有一些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先生还将她的论文以油印本形式装订成册,寄赠安徽的一些戴震研究机构,并送给自己的研究生们作为学习资料。李红英《近十五年戴学研究综述》(见《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中说:“在音韵训诂、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有于靖嘉的《〈转语〉和古代语文教学》。”在戴学的这个门类中首列了于先生的著述。学界研究戴震转语时也多有引用于先生观点者。如钟如雄《“转语”方法论》(见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6期)引用了于先生的《戴东原〈转语〉声类表解析》(此文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

4期);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吴家宜的硕士论文《古音对转说研究》(指导教师为著名学者陈新雄教授),参考了于先生《戴东原《转语》考索》;杨光荣《同源词理论的皖系与〈释名〉系之分》(黄山学院学报2000年1期)引用了于先生论文《训诂学在古籍整理上的重要性和整理戴震〈转语〉的体会》。

杨光荣著《词源观念史》第二章“皖派同源词理论的初步成型及进一步发展”下的2.1.7节,题为“钱门弟子于靖嘉对戴震《转语》的发掘”。其中列出了于先生的部分论文篇目。并分“复原《转语》真貌”、“求证《转语》”、“《转语》的传承”三个部分归纳了于先生对皖派同源词理论初步成型的贡献。最后这样评价:“于靖嘉历经五年,终于复原了戴震《转语》的真貌,捋清了从戴氏而孔氏而张氏而章氏而黄氏的一脉传承关系,于皖派同源词理论,贡献可谓大矣。”(见巴蜀书社2007年3月出版,p.204~210,本书后亦节录了相关部分,供参阅。)

先生是老北师大的高材生,且口才十分好,所参加的会议总会被邀请即兴讲话,她也总能紧扣主题,画龙点睛,精辟点评。同时她洞察人情,幽默风趣,抑扬顿挫,常常能引起共鸣而赢得听众的阵阵掌声和欢笑。1987年我们曾陪先生参加了浙江富阳的训诂学会。会上,被时任训诂学会会长的许嘉璐教授等推举上台讲演点评,很是出彩。田忠侠在他的《辞源通考》跋中这样写道:“1987年4月,中国训诂学会于浙江富阳召开年会,尝以《辞源考订·绪论》为题而论《辞源》之得失。发言甫毕,组内专家周大璞、杨春霖、周本淳、郭诚永、于靖嘉诸教授热烈评议,于拙著及治学精神多有谬许,咸谓余之《辞源考订》乃承乾嘉学派朴学遗风,宜为发扬”,其中提到于先生的点评,于先生参加学术会议之

活跃可见一斑。先生每每与老一代学者们互赠诗作，结下了美好的情谊。后来先生年事渐高，不能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了，但我们常常为先生带回许多著名学者托我们转达的问候。作为于先生的弟子，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先生坎坷而充实地走完了她人生的历程。《语文研究》杂志2007年2期如此报道了于先生逝世的消息：“语言学家、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于靖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12月4日在太原逝世，享年九十七岁。”

我们有幸师从先生学习和工作二十余年，从先生身上看到了她做人的正直与刚毅、领略了她做学问的认真与执着，先生通过她的授业、解惑给予了我们在治学上的启迪，并用她对学生无私的大爱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师恩难忘，师德永存！

于靖嘉先生传略

萧泰芳 严成华

于靖嘉先生，曾用名于秀文，号瀛波，1909年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贫苦店员家庭。受家境所限，到十二岁方有文化学习机会。她白天干活，夜晚隔窗偷听同居一院的老儒教子，即使严寒冬夜也未间断。历时八年，硬是偷学完了整部《四书》和半部《诗经》。

先生自强自立、不畏艰苦的性格，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学徒、收入微薄的兄长，使她得以如愿就读于新民初师。那时的初师不收食宿费和学杂费，但要靠兄长省吃俭用资助购买书籍文具。时年二十岁的先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悬梁刺股的精神刻苦学习，三年考试独占鳌头，连夺十五个第一名，被老师和同学誉为“铁第一”。

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和优异的学习成绩，感动了校方和老师，他们设法帮助先生投考中师。先生果然不负众望，于1931年秋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入沈阳中师。

孰料入学十八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先生被迫返乡。为了躲避日寇的欺辱，她与众姐妹削发为尼，避难庙

庵。次年,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心,只身入关求学,成为第一批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一员。为了能考进张学良将军设立于北平的东北中学高中部,从未学过英语的先生,以三个月的时间自学了初中三年的英语课程,随高中一年级考试,获得 90 分的高分。为此,先生整整一个冬天立雪迎风于路灯之下,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所付代价极为沉重。

1935 年东北中学高中毕业后,随即升入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大学史地系学习。先生本可在此校当一个衣食无忧的大学生,但是为了教育救国、毕生自立,决然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那时的北师大是穷苦学生的福地,除去衣食外全为公费。先生身着补丁衣,每日以半个到一个窝头充饥,过着难求温饱、十分清贫的生活。

“七·七”事变后,先生再次流亡,随校迁移到陕西城固,就读于由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北洋文学院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

在大学就读期间,先生满怀国仇家恨,愤然参加了“一二·九”(1935 年)爱国救亡运动,加入了旧学联、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等我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编写《剪编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先生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不惧危险、全力以赴。

1940 年大学毕业,因上学过晚,此时她已 31 岁。大学毕业后,先生与同具爱国思想的化学家严德浩先生结婚,或举家或只身携子,辗转于甘肃、青海、广西、贵州等地教书。最后落脚到兰州,入西北师范学院攻读研究生,半年后兼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1948 年,通过国家教育部考试,晋升为讲师,执教西北师院直至 1949 年 11 月离开兰州。

1950年2月至12月,先生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来太原工作。1950年至1953年,在太原一师任语文教员并兼任师四班班主任。由于先生视学生如子女,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使她和她的学生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感情,从未因数十年的岁月流逝而稍减。师四班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先生也因工作需要而调离了太原一师,但她的学生们几乎每年都有人来登门拜年。直至先生八十和九十两个高寿华诞时,当年受教于先生的太师学生还自动邀集在一起为先生庆寿。先生知识广博,学术功底深厚,教学艺术精湛,教学工作获得师生赞扬,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受到嘉奖。

1953年,先生调到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任教,1955年,又调到山西教育干部学校任教。与著名语文教师张宪堂搭档,张宪堂教文学课,先生教语言课,为该校最受欢迎的两位语文教师,一提到“张于”,人们便交口称赞。1956年,先生经多年考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反右斗争”后,山西师范学院(现在的山西大学前身)严重缺员,先生被调入师院任古代汉语教师。那时,高校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大多是任课教师自编讲义,古汉语基础课也是这样。1961年国家教育部制定的“高教六十条”出台,要求每门课都须有系统教材。其时先生被安排给中文系59级本科生授课,每周四课时,一共要上三个学期。为了使學生能获得系统知识,先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夜以继日地赶编出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古汉语语法在内的四大本油印教材。当时正处于国家经济的三年特殊困难时期,缺乏营养加上过度劳累,致使先生腿脚浮肿,上下楼都非常吃力。但她讲起课来仍然满怀激情、神采

奕奕,丝毫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

1966年后,国家发生了“十年大动乱”,大批老同志遭到迫害,就连像先生这样的出身贫寒、历史清白、一向爱国爱党、全心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奉献的单纯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而且株连到一家老小五口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先生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为人民教育事业勤奋工作的态度丝毫未变。

1972年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系里搞所谓“教学革命”,古汉语课作为重点“革命”对象而被裁去,原有古汉语教师全部改行,先生和她自1963年起就带的一名助教被改派教了毛主席诗词。先生在政治待遇尚未完全恢复、精神压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和她的助教在三年时间内编写出《毛主席诗词讲稿》、《毛主席诗词学习参考资料》、《毛主席诗词选讲》(附《诗词格律常识》)三种油印教材。

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治、历史发生了转变,先生身上的精神枷锁彻底被解脱,年近七旬的先生又焕发出了为人民教育事业工作的巨大活力。1977年,系里在整顿教学秩序的过程中,同时恢复了古汉语教研组建制和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并任命先生为汉语教研室主任。当时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还没有重新印行,为了应急,先生又和本组的另一位老先生合编了上、下两册的古汉语讲义。

1978年,学校为了加强传统文化课的基础教学,人文学科的历史系、教育系和外语系的日语专业,也都开设了古汉语课程,并要求中文系派教师去上课。但在此前,中文系因大搞“教学革命”淘汰了古汉语课,原有的古汉语教师严重流失,有的调到外校,有的改做行政工作,只留两老一小三人,要给那么多班级